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

——上海城镇居民调查

孙远太

摘要: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对上海城镇居民的经验研究发现: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时存在;低教育背景家庭借助文化活动参与实现了文化流动,高教育背景家庭通过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文化再生产;那些低收入家庭通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实现着向上流动。

关键词:文化资本 教育获得 文化再生产 文化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获得研究关注的是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有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教育获得是与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模式分不开的。教育既有助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维持,也是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制约下进行的。本研究以国外文献中常用的指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测量文化资本,并检验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和文化流动(Cultural Mobility)两个假设在国内的适用性问题。

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谁从文化资本中获益

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是关于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成就作用机制随家庭地位不同而变化的两种模式。布迪厄和帕斯隆(Bourdieu & Passeron, 1977)最早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他们认为,那些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由于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最有社会价值的文化活动模式,他们的父母也通常受过大学教育,这些文化继承者能从文化资本中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下层阶级学生比上层阶级学生更加依赖学校来获得文化资本。下层阶级的幸存者通过突出的思维能力、个人努力、特殊的家庭或社会环境获取以学术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弥补了他们先天文化资本不足的缺陷。“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但是,在需要更广泛文化知识的问题上,下层阶级学生不能取得好的分数,因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同学的背景(P. 布尔迪约, J. - C. 帕斯隆, 2004: 22)。尽管出身下层阶级的学生在学术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因为在文化风格上过于“学术化”而显现出先天文化不足的痕迹。总之,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上层阶级子女的文化资本更多地从家庭中获得,下层阶级的子女因家庭文化资本不足而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

文化流动模式认为文化资本为家庭背景较低的学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路径。迪马奇奥(DiMaggio, 1982)验证了文化资本与学生在校表现尤其是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后,又依据文化再生产模式和文化迁移模式分别提出了假设。文化再生产模式的假设是: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与学生在校各种表现之间的中介;文化资本的回报对于来自较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学生来说相当高,对于来自较低社会地位家庭的学生来说则相当低。文化迁移模式的假设是:文化资本对学生在校表现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扣除了(net of)家庭背景的影响;不具备文化资本优势的那些学生所得到的文化资本回报相当高。在比较文化再生产模式和文化迁移模式后,迪马奇奥(DiMaggio, 1982)发现在女性中文化资本对四个科目学习成绩的影响随着父亲教育背景的提高而增加。根据文化再生产模式的

推论,对文化资本反映最大的是来自上层家庭背景的女性,反映最小的是来自底层家庭背景的女性。与此相反,在男生中文化资本对成绩的积极影响仅限于那些来自底层或中等家庭的学生,父亲大学毕业的学生不太可能获得好成绩,这些结果与文化迁移模式的推论一致。因此,文化资本对学业表现的影响体现出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而言更接近于文化再生产模式,男性则更接近于文化迁移模式。

德·格拉夫(De Graaf,2000)等人在荷兰的经验研究中,认为文化流动假设而不是文化再生产假设能够提供文化资本如何发挥作用更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来自高社会地位的父母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很多特权,这些父母完成较高的教育,而且至少一位来自较高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更可能偏好其它的休闲活动,或者没有时间进行文化活动,他们并不全都能够为子女提供较多的文化资本。因此,在社会背景和文化活动之间没有决定性关系。那些家庭社会背景高的孩子即使父母不参与文化活动,由于总是处于教育场域之内,他们也能保持较多的特权。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他们一般持有较低的教育标准,以及较少关于教育体制的知识。因此,这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相对外在于教育场域。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的文化资本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环境和学校的差距。如果父母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阅读书籍,最终可以获取在学校有所回报的文化能力和技能。在荷兰的研究证实了文化流动假设,家庭文化资本对那些来自家庭背景较低的孩子更为重要,社会出身高的孩子在学校做的很好,而父母的文化习性对他们的成功贡献不大。

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是关于文化资本作用机制两种竞争性的假设,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都得到经验证据支持(Aschaffenburg & Maas,1997; Bourdieu & Passeron,1977; DiMaggio,1982; Kalmijn & Kraaykamp,1996;)。在不同的社会里,文化资本在教育获得中的作用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中不同阶级间文化资本占有的“不均衡性”特征(Shaoguang Wang, Deborah Davis & Yanjie Bian,2006)。在中国的教育获得中,文化资本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作用如何?在中国的教育获得中是表现为文化再生产,还是表现出文化流动的特征?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三、分析策略与主要变量

(一)研究假设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阶层地位、家庭教育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包括家庭阶层地位、家庭教育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假设一: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些处于较高阶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更长的教育年限。

假设二: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些父母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子女,能够获得更长的教育年限。

假设三: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是存在的。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更长的教育年限。

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的中介机制。文化资本包括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两个指标。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都会对子女的教育获得产生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

假设四: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都会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影响。

假设五:家庭文化氛围比文化活动参与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影响大。

家庭背景既可以直接影响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中介机制发挥影响,这种中介机制就是文化资本。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直接再生产机制,后者则是一种间接再生产机制。

假设六: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同时存在,教育不平等呈现出直

接再生产和间接再生产并存的特征。

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在家庭教育地位‘不同的样本中会发生变化。根据文化再生产假设,文化资本对于那些家庭教育地位较高的子女作用更大。文化流动假设则与此相反,认为文化资本对于那些家庭教育地位较低的子女作用更大。

假设七:家庭教育地位越高,文化资本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越大。

假设八:家庭教育地位越低,文化资本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越大。

除了家庭教育背景外,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在家庭经济背景不同的样本中,文化资本作用变化的情况。根据文化再生产假设,文化资本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子女作用更大。文化流动假设则与此相反,认为文化资本对于那些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子女作用更大。

假设九: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本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越大。

假设十:家庭经济地位越低,文化资本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越大。

(二)分析策略

作为一项经验研究,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8 年度的“上海市民生活现状调查”。在调查问题中,涉及了被访者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经历问题。其中,在教育经历方面,根据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常用方法,测量了被访者 14 岁时的家庭背景,以及当时的文化活动。调查采用了分段随机抽样方法,访问对象限于 20-65 周岁的城镇住户,共完成问卷 5000 份。在本次分析中,由于一些问题的缺失,实际有效分析样本总量 4107 个。其中,男性样本占 41.4%,女性样本占 58.6%。

为了测量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技术。模型的因变量为初中以上教育年限,自变量包括家庭阶层地位、家庭教育地位、家庭经济地位、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性别、出生地和出生组为控制变量。

教育获得:由于调查中的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都是 14 岁时的情况,因而研究中主要分析初中以上教育获得问题。初中以上教育年限以实际教育年限减去 9 年得到。

家庭阶层地位:以被访者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测量。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体力劳动者,以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组。

家庭教育地位:用父亲 14 岁时教育程度和母亲 14 岁时教育程度转换为教育年限后,相加而得到。

家庭经济地位:用被访者 14 岁时家庭的收入测量。先对每一年度的家庭收入计算平均值,然后用家庭实际收入减去平均值,根据结果等于或高于平均值的高收入组,低于平均值的为低收入组,以低收入组为参照组。

性别:男 = 1、女 = 0。

居住地:市区 = 1、郊区 = 0。

出生组:出生组 1(1943 年至 1950 年)、出生组 2(1951 年至 1962 年)、出生组 3(1963 年至 1976 年)、出生组 4(1977 年至 1988 年)。出生组 1 为参照组。以 16 岁作为进入高中的入学年龄,1943 年至 1950 年出生的居民在“文革”前进入高中,1951 年至 1962 年出生的居民在“文革”期间进入高中,1963 年至 1976 年出生的居民在改革初期进入高中,1977 年至 1988 年出生的居民在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后进入高中。

文化活动参与:14 岁时观看童话剧、参观艺术展览、参观博物馆的情况。题目以“没有”、“偶尔”、“经常”来回答,分别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根据因子分析的因素得分,得分越高表明文化活动参与越多。

家庭文化氛围:14 岁时父母看书或阅报、父母在桌子上写字的情况。题目以“没有”、“偶尔”、“经常”来回答,分别赋值为 1 分、2 分、3 分,根据因子分析的因素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文化氛围越好。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影响

在全体样本的教育获得回归模型中,为了分析家庭背景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的影响,采用的是逐步加入变量的方法。首先加入的是控制变量,检验人口特征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然后加入自变量,检验家庭背景变量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接着建立中介变量模型,检验文化资本变量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最后是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联合模型,检验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家庭背景变量的变化情况。下面将分别对假设一、假设二、假设三、假设四、假设五和假设六进行检验。

表 1 全体样本初中以上教育年限的回归分析(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女性=0)	.114 (.077)	.185 * (.074)	.182 * (.075)	.217 * * (.074)
出生地(郊区=0)	1.654 * * * (.078)	1.133 * * * (.083)	1.153 * * * (.083)	.869 * * * (.085)
参照组:出生组 1				
出生组 2	.427 * * * (.101)	.359 * * * (.098)	.316 * * (.098)	.292 * * (.097)
出生组 3	1.644 * * * (.117)	1.320 * * * (.117)	1.439 * * * (.115)	1.244 * * * (.116)
出生组 4	3.750 * * * (.137)	2.969 * * * (.147)	3.386 * * * (.135)	2.863 * * * (.146)
参照组: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		.596 * * (.174)		.475 * * (.172)
技术人员		.705 * * * (.131)		.560 * * * (.130)
办事人员		.545 * * * (.119)		.476 * * * (.118)
商业服务业人员		.347 * * (.131)		.311 * (.130)
家庭教育地位		.090 * * * (.009)		.070 * * * (.009)
家庭经济地位				
(低收入组=0)		.291 * * * (.083)		.240 * * (.082)
文化活动参与			.409 * * * (.039)	.348 * * * (.039)
家庭文化氛围			.488 * * * (.038)	.294 * * * (.040)
常数项	.188 (.106)	-.910 * * * (.133)	.587 * * * (.106)	-.379 * * (.141)
F 值	273.078 * * *	160.884 * * *	243.358 * * *	149.221 * * *
N	4107	4107	4107	4107
R ²	.249	.302	.294	.32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 P<0.01 *** P<0.001。

模型 1 是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控制变量模型。在不加入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变量时,出生地和出生组都对初中以上教育年限有影响。从出生地变量可以看出,出生于市区比出生于郊区的居民初中以上教育年限高 1.65 年,教育获得中的城乡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在出生组变量中,出生于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出生于第一个时期,说明随着出生时期的后移,上海城镇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模型的决定系数为 25%,控制变量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作用较大。后面的模型将研究在控制住城乡因素和教育扩张因素后,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导致的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不平等问题。

对假设一的检验。由模型 2 可以看出,在家庭阶层地位变量中,非体力劳动者阶层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都高于体力劳动者子女。差距最大的是技术人员子女与体力劳动者子女,最小的是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与体力劳动者子女,但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随着教育发展和教育扩张,不同阶层地位家庭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并没有得到消除。那些较高阶层地位家庭的子女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依然占有优势。假设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对假设二的检验。在模型 2 中,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以父母受教育年限测量的家庭教育地位每增加 1 个单位,子女初中以上受教育年限将提高 0.09 年。这表明家庭教育地位对子女初中以上教

育年限有影响,父母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就越长。假设二得到验证。

对假设三的检验。在模型2中,控制住其他变量后,家庭经济地位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的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初中以上受教育年限比低收入家庭子女高0.29年。这表明家庭经济地位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有影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就越长。假设三得到验证。

对假设四的检验。模型3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示,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对初中以上教育年限的影响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就越长。假设四得到验证。

对假设五的检验。对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文化活动和家庭文化氛围都对初中以上教育年限有正向作用,但二者的影响有差异。在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中,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大于文化活动参与的影响。因此,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比参与文化活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更有助于提高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假设五得到验证。

对假设六的检验。模型4是家庭背景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的联合模型,用于比较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家庭背景变量的各项回归系数均有所降低,但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在联合模型中,家庭阶层地位、家庭教育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的影响仍然存在。与家庭背景变量的变化类似,文化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降低,但对初中以上教育年限的影响没有消失。在引入文化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前者是家庭背景直接作用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后者是家庭背景通过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那部分影响。研究发现,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家庭背景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得到支持。假设六得到验证。

决定系数(R^2)的变化情况显示了不同模型解释力情况。模型2中加入家庭背景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控制变量模型提高(5.3%),在模型3中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控制变量模型提高了4.5%,在模型4中同时加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7.3%,高于前两个模型。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共同发挥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差异在控制变量模型中没有体现,但加入家庭背景或者文化资本变量后,性别的影响上升,而且具有了显著性,表明家庭背景、文化资本都与性别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二)家庭教育地位不同导致文化资本作用的差异

对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假设进行检验时,学者们一般用父亲教育程度代表家庭地位,根据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划分家庭地位的高低(DiMaggio, 1982; De Graaf, 2000)。在本研究中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来测量家庭教育地位,延续前人的研究思路,我们使用父亲的教育程度作为测量家庭教育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根据父亲教育程度的不同,把全体样本划分为家庭低教育组(小学及以下)、家庭中教育组(初中)和家庭高教育组(高中及以上)。在具体的分析中,对这三个组分别建立回归模型,检验文化资本在这三个家庭教育组作用的差异性。

对假设七和假设八的检验。假设七和假设八阐述的是在教育地位不同的家庭中,文化资本对于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作用的差异性。下面将首先分析在模型中加入文化资本后,三个家庭教育组中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变化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总结假设的验证问题。

在家庭低教育组中,模型2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模型1提高了3.1%。在控制变量中,出生地和出生组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影响没有消失;性别的差异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加大。在家庭背景变量中,家庭阶层地位的回归系数均有所降低,其中办事人员的优势在加入文化资本后消失;以父母受教育年限表示的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在加入文化资本后消失;家庭经济地位高的优势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但并没有消失。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化活动参与的作用大于家庭文化氛围。

表 2 家庭教育地位分组样本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回归分析(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家庭低教育组		家庭中教育组		家庭高教育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女性=0)	.336 * * (.106)	.365 * * * (.104)	.006(.141)	.004(.141)	.155(.151)	.226(.149)
出生地(郊区=0)	1.439 * * * (.115)	1.079 * * * (.120)	.684 * * * (.162)	.549 * * * (.166)	.477 * * (.190)	.260(.190)
参照组:						
出生组 1						
出生组 2	.453 * * * (.125)	.363 * * * (.123)	.016(.220)	.002(.219)	.010(.244)	-.025(.239)
出生组 3	1.481 * * * (.159)	1.347 * * * (.157)	.774 * * * (.249)	.771 * * * (.248)	.936 * * * (.267)	.904 * * * (.261)
出生组 4	3.462 * * * (.372)	3.201 * * * (.367)	2.457 * * * (.265)	2.412 * * * (.265)	2.473 * * * (.261)	2.502 * * * (.257)
参照组:						
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	.651(.349)	.570(.343)	.497(.297)	.467(.296)	.668 * * (.258)	.448(.254)
技术人员	.961 * * * (.249)	.806 * * * (.245)	.912 * * * (.241)	.826 * * * (.242)	.546 * * * (.204)	.366(.201)
办事人员	.478 * (.228)	.379(.225)	.358(.185)	.330(.185)	.771 * * * (.203)	.674 * * * (.199)
商业服务业人员	.431 * (.183)	.365 * (.180)	-.111(.233)	-.111(.232)	.749 * * (.318)	.653 * * (.311)
家庭教育地位	.094 * (.045)	.071(.044)	.148 * * * (.030)	.137 * * * (.031)	.094 * * * (.019)	.074 * * * (.019)
家庭经济地位	.315 *	.255 *	.313 *	.280 *	.143	.111
(低收入组=0)	(.128)	(.126)	(.141)	(.140)	(.154)	(.150)
文化活动参与		.464 * * * (.058)		.217 * * (.068)		.216 * * (.072)
家庭文化氛围		.320 * * (.059)		.100(.072)		.457 * * * (.076)
常数项	-1.299 * * (.467)	-.633(.465)	-.994 * * * (.161)	-.417 * (.170)	-.150(.449)	.243(.444)
F 值	32.465 * * *	34.902 * * *	26.266 * * *	23.276 * * *	27.316 * * *	27.320 * * *
N	2260	2260	1047	1047	800	800
R ²	.137	.168	.218	.227	.276	.31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 P<0.01; *** P<0.001。

在家庭中教育组中,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 4 比模型 3 的解释力仅仅提高了 0.9%。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差异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前后均没有显现;出生于市区的优势有所下降;出生组 2 在加入文化资本前后相对于参照组均没有优势,出生组 3 和出生组 4 的优势变化不大。在家庭背景变量中,家庭阶层地位变量中只有技术人员出现优势,而且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以父母受教育年限表示的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家庭经济地位高的优势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中,文化活动参与的作用达到显著性,但较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并没有作用。

在家庭高教育组中,模型 6 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模型 5 提高了 3.5%。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差异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前后均没有显现;出生于市区的优势消失;与家庭中教育组类似,出生组 2 在加入文化资本前后相对于参照组均没有优势,出生组 3 和出生组 4 的优势变化不大。在家庭阶层地位变量中,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优势在加入文化资本后消失,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优势降低;以父母受教育年限表示的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家庭经济地位高的优势在加入文化资本前后均没有出现。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化活动参与的作用小于家庭文化氛围。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家庭教育地位不同的样本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不同作用机制。在家庭低教育组和家庭高教育组中,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幅度较大。在这两个组中,家庭背景更多地通过文化资本影响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都获得经验支持。在家庭中教育组中,研究发现不同阶层中只有技术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有优势,以父母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家庭教育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较大,说明在这个组中,父母的教育优势和家庭的经济优势直接作用于子女的教育获得过程。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在教育地位较高的家庭和家庭教育地位较低的家庭作用较大,但是在教育地位处于中等的家庭作用较小。假设七和假设八都得到部分验证。研究还显示,在教育地位不同的家庭中,文化资本所发挥作用的途径是不同的。在家庭中、低教育组中,文化资本更多地是通过文化活动参与而不是家庭文化氛围影响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在家庭高教育组中,这种影响则更多的是通过家庭文化氛围

而实现的。

(三)家庭经济地位不同导致文化资本作用的差异

除了分析家庭不同导致文化资本作用不同外,家庭经济地位也是测量家庭背景差异的重要指标。随着家庭经济地位的不同,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是否会出现差异性?因此,本研究根据家庭经济收入的不同进行分组,把全体样本分为家庭低收入组和家庭高收入组,比较家庭经济地位不同的样本组中文化资本的作用。

表 3 家庭经济地位分组样本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回归分析(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家庭低收入组		家庭高收入组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女性=0)	.185 * (.093)	.199 * (.093)	.211(.122)	.266 * (.122)
出生地(郊区=0)	1.130 * * * (.097)	.818 * * * (.102)	.973 * * * (.167)	.803 * * * (.169)
参照组:出生组 1				
出生组 2	.541 * * * (.124)	.433 * * * (.122)	-.052(.158)	-.053(.157)
出生组 3	1.483 * * * (.142)	1.342 * * * (.141)	.826 * * * (.214)	.864 * * * (.212)
出生组 4	3.190 * * * (.192)	3.008 * * * (.191)	2.406 * * * (.229)	2.415 * * * (.228)
参照组:体力劳动者				
管理人员	.842 * * (.264)	.748 * * (.260)	.306(.223)	.180(.223)
技术人员	.903 * * * (.179)	.739 * * * (.177)	.364(.188)	.254(.187)
办事人员	.713 * * * (.164)	.644 * * * (.162)	.263(.169)	.198(.168)
商业服务业人员	.379 * (.164)	.316(.161)	.208(.217)	.201(.216)
家庭教育地位	.093 * * * (.012)	.071 * * * (.012)	.092 * * * (.012)	.075 * * * (.012)
文化活动参与		.420 * * * (.050)		.211 * * * (.059)
家庭文化氛围		.301 * * * (.051)		.269 * * * (.063)
常数项	-1.143 * * * (.170)	-.508 * * (.182)	-.994(.161)	-.417(.170)
F 值	111.669 * * *	103.961 * * *	49.710 * * *	44.451 * * *
N	2772	2772	1335	1335
R ²	.288	.311	.273	.28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5 ** P<0.01 *** P<0.001。

对假设九和假设十的检验。延续前一部分的分析逻辑,首先比较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家庭中,文化资本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作用,然后得出假设的验证情况。

在家庭低收入组中,模型 2 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模型 1 提高了 2.3%。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差异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增大;出生于市区的优势降低;出生组 2、出生组 3、出生组 4 的回归系数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但相对于参照组的优势没有消失。在家庭阶层地位变量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优势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以父母受教育年限表示的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化活动参与的作用大于家庭文化氛围。

在家庭高收入组中,模型 4 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解释力比模型 3 提高了 1.4%。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差异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出现;出生于市区的优势降低;出生组 3、出生组 4 在加入文化资本后相对于参照组的优势微弱增加,出生组 2 的优势没有出现。在家庭阶层地位变量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均没有优势;以父母受教育年限表示的家庭教育地位的影响在加入文化资本后降低。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文化活动参与的作用小于家庭文化氛围。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影响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差异性。根据加入文化资本后模型的决定系数变化情况,文化资本在低收入家庭中的作用大于高收入家庭中的作用,这一点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中也得到支持。假设十而不是假设九得到验证,即文化流动假设得到验证。家庭阶层地位的优势在低收入家庭中得到体现,

但是在高收入家庭中阶层地位优势并不存在,说明家庭的经济背景在高收入家庭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家庭教育背景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的地位差异不大。文化资本两个变量的具体比较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更多地是通过文化活动参与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在高收入家庭这种影响则更多地是通过家庭文化氛围发挥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首先,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的影响在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同时存在,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得到支持。家庭背景中的阶层背景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作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高于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女。家庭背景中的教育背景也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影响,父母所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就越长。家庭背景中的经济背景对初中以上教育活动有影响,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初中以上教育年限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都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影响。不同于德·格拉夫(De Graaf, 2000)等人在荷兰的发现,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独立模型中,包括父母阅读活动的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大于文化活动参与,但是在文化资本和家庭背景联合模型中,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小于文化活动参与,表明文化资本两个变量在不同家庭背景的作用机制有差异。尽管作用有所降低,家庭背景变量对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并没有因加入文化资本变量而消失,这一点与苏利文(Sullivan, 2001)在英国伦敦的发现类似,表明在控制文化资本变量后,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仍是存在的。有学者通过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研究发现: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家庭背景的直接作用消失了(刘精明, 2005: 281)。该研究在分析中尽管控制住了地方经济水平,但没有控制出生时期的影响,本文前面的分析表明出生时期不同,初中以上的教育年限有很大的差异。总之,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在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影响同时存在,教育过程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呈现直接再生产和间接再生产并存的特征。

其次,家庭教育地位不同导致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出现差异性特征,文化资本在家庭低教育组和家庭高教育组中的作用较大。在家庭低教育组、家庭中教育组和家庭高教育组三个独立的回归模型中,文化资本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但是,从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决定系数改变情况看,文化资本在不同教育背景的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异的。文化资本变量对家庭高教育组模型的改进最大(3.5%),证明了文化再生产假设。与此同时,文化资本变量对家庭低教育组模型的改进(3.1%)与家庭高教育组模型的改进差异很小,文化流动假设也能得到验证。文化再生产模式和文化流动模式同时得到验证似乎是矛盾的。然而,通过对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资本在不同教育地位家庭中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教育地位家庭中,家庭的文化活动参与更多地影响着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在高教育地位家庭中,较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更大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者,检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假设时并没有对文化资本的两个变量进行区分,因而在这些文献中或者文化再生产假设或者文化流动假设得到验证。在本研究中发现了初中以上教育获得中文化再生产和文化流动并存的现象,这是因为高教育背景家庭和低教育背景家庭通过不同的文化资本因素影响子女的教育过程。前者通过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文化再生产,后者则借助文化活动参与熟悉主流文化而达到了文化流动的目标。

最后,家庭经济地位不同导致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出现差异性特征,文化资本在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获得中的作用小于在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根据家庭教育地位分组建立独立回归模型后,研究还对家庭收入进行了分组,检验家庭经济地位不同导致文化资本作用的差异性。在家庭低收入组和家庭高收入组的独立回归模型中,文化资本的作用都是存在的。从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模型的决定系数改变情况看,文化资本在不同经济背景家庭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文化资本变量对家庭低收入组模型的改进(2.3%)大于对家庭高收入组模型的改进(1.4%),文化流动假设得到验证。通过对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进一步分析也发现文化流动的特征以及文化资本在不同经

济背景家庭中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文化氛围在低收入家庭的影响都高于高收入家庭。在低收入家庭中,家庭的文化活动参与更多地影响着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在高收入家庭中,较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有更大的影响。以父母受教育年限测量的家庭教育地位在两个模型中的影响相似。以往的研究都是根据家庭教育地位探讨文化资本的不同作用机制,忽略了家庭经济地位不同导致的文化资本作用差异。本研究分析了在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中,文化资本对子女初中以上教育获得的作用,经验证据支持了文化流动假设。那些低收入家庭通过更多的文化活动参与和较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实现了向上流动。

参考文献:

- 刘精明,2005,《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 [法]P.布尔迪约、J. - C.帕斯隆,2004,《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
- Aschaffenburg Karen & Ineke Maas 1997.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2. pp. 573 – 587.
- Bourdieu Pierre & Jean Claude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De Graaf Nan Dirk, De Graaf Paul M & Gerbert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73(2). pp. 92 – 111.
-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 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7. pp. 189 – 201.
- Kalmijn Matthijs & Gerbert Kraaykamp 1996,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69. pp. 22 – 34.
- Shaoguang Wang, Deborah Davis & Yanjie Bian 2006,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Book Reading in Urban China”, *Modern China*, Vol32(3). pp. 315 – 348.
- Sullivan Alice 2001,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Vol35(4). pp. 893 – 912.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易众